

聆听历史回响 追寻大师足迹

—— 上海海洋大学纪念侯朝海、陈子英、朱元鼎
诞辰 120 周年文集

上海海洋大学

2016 年 11 月

聆听历史回响 追寻大师足迹

—— 上海海洋大学纪念侯朝海、陈子英、朱元鼎
诞辰 120 周年文集

上海海洋大学

2016 年 11 月

目 录

心系国家 终身努力	叶 骏	1
纪念陈子英教授诞辰 120 周年	王义强	6
光辉业绩 大师风范	苏锦祥	8
爱渔胜爱家 爱生胜爱子	侯笙乐	10
回忆元鼎先生二三事	伍汉霖	13
缅怀恩师 继往开来	宋佳坤	17
悼念恩师侯朝海校长	沈金鳌	20
记忆中的侯校长	毕定邦	22
怀念侯朝海师	黄永萌	24
深情怀念侯朝海先生	林济时	33
三老颂歌	蔡和麟	36
追忆在朱老身边的二三事	赵盛龙	38
激情忆恩师	周汝僂	41
恩师启蒙 人生启航	钟俊生	44
我心中的朱元鼎先生	鲍宝龙	47
亲历两校百年	赵尚林	49
“三家”均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学校“敬业”	陈永强	53
终生兴渔 爱徒胜子	宁 波	59
身先两学 理必求察	宁 波	64
痴情鱼类 为人师表	宁 波	68
提携后学 甘为人梯	宁 波	78

热爱是事业成功的基石	邱郁春	80
沿着朱元鼎先生昭示的道路继续奋斗	姜地忠	82
继往开来 砥砺前行	廖尹航	83
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的他	李 琦	85
守得云开见月明	茅 寅	88
勤朴忠实	张陈妮	91
人间萍客 以梦为马	黎诗亭	93
怀念尊敬的侯海朝先生	沈汉祥	97
纪念恩师侯朝海先生	丁永良	98
简陋的校舍 一流的师资	张汉嘉 陆廷龙	99
我的老同学侯朝海	姚詠平	104
我记忆深刻的侯朝海先生	严正伦	106
忆念老校长侯朝海先生	郁尧山	107
与侯朝海先生共事的岁月	叶思九	116

心系国家 终身努力

叶 骏

今年是上海海洋大学的三位老学长朱元鼎、侯朝海和陈子英诞辰 120 周年。作为《朱元鼎传》《侯朝海传》和《湛湛人生》的主编，我有幸较为详细地阅读了与他们有关的史料，并从他们的人生轨迹中悟出了他们的思想情操和师德风范。现把我的学习体会整理出来，与学校师生共享。

一、少年立志，报效祖国

三位老学长生长的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变动最剧烈的年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推翻封建王朝的伟大革命中，15 岁的侯朝海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初年，当日本人觊觎我国利益、诱使国民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日子里，19 岁的中学生朱元鼎就写出了好几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东洋绸缎》《国货调查录》，文章以诙谐、尖锐的笔法，讽刺了日货质量和一些人崇洋心理；他和同学一起实地调查，推介国货，望国人使用国货，以阻止“利源外溢”。那是 1915 年，正值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之际，一个 19 岁的中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爱国之情溢于言表。正是有这种志向，他女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那国难当头的敌伪时期，他始终坚信中国必胜，日寇必败，他断然拒绝日寇当局多次邀请赴日开会观光，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崇高的民族气节”。我们常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的志向，不光决定了他们人生的走向，还为日后报效祖国奠定了基础。

当国共两党对峙、大陆政权更替的关键时刻，作为曾经在国民政府中任过职的侯朝海为什么选择了留下，并保住学校完整地交给新政府，除了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有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我又从他解放后一次次写的“思想交代”里找到了答案。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博古）是无锡老乡，从

小就认识,1941 年他在国民政府任职时,与秦邦宪在重庆相逢,有过深入的交谈,从而使他对国家发展的前途有了明确的认识。看到这些资料,我真是非常激动,为我党当时的高瞻远瞩令众多知识分子折服而感到自豪,同时,内心又为解放以后我们错误对待一大批知识分子而感到不安。我们说,爱国是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当国家前途、国民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选择光明的前途、始终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爱国的壮举。侯朝海是这样,朱元鼎、陈子英也是这样,两位留美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做出了重要的抉择。我还看到,当朱元鼎 80 多岁还在不停地工作时,他是这样对年轻教师说的,60 年代曾多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总理勉励他要把水产教育和科研工作搞好,“可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呀!”这是多么可敬的报国之情呵。三位老学长从小立下大志,为国家、为学校、为科研事业努力工作一辈子,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 21 世纪,世异时移,国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否认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生活、学习、工作的具体目标,但我们更应该像三位老学长那样有远大的志向和宏伟的目标。当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的时候,我们高校的师生难道不应该走在前面么?当我们看到先辈们为维护海权、增强海防而创办水产学校的时候,作为现在海洋大学的师生应该更加努力地把学习、工作和研究做好,为国家的海洋战略服务,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正如孙中山所云:“个人、社会,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发明,而未可以是非之也”。当我们为社会做贡献的时候,在“大我”目标不断实现的时候,个人的实惠、“小我”的目标自然会逐步达到的。

二、一生奋斗,术有专攻

凡是做事情,能够取得成功者,其背后所付出的艰辛肯定是很的。三位老学长在各自的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他们倾毕生的精力在所从事的工作上。朱元鼎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投入鱼类分类学研究,一直到 80 年代,前后半个世纪,一共发表了 500 多万字、计 60 多部(篇)的专著和论文,真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他的创新与建树确立了他在鱼类分类学上的泰斗地位。侯

朝海用将近 40 年的时间来积极推进水产教育，无论是在上海吴淞、还是在厦门的集美，或是到四川合川、再回到上海的复兴岛，他都是千方百计去筹措办学经费，想方设法去聘请优秀教师，要把水产学校坚持办下去并办出水平。他的付出可谓巨大，他的成就永远令后人铭记。他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孜孜不倦投身水产教育的俊杰，是我们学校历经战火和搬迁而未中断办学的功臣。陈子英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研究金鱼的遗传育种、研究现代海洋生物学，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尤其以“陈子英文昌鱼”的发现和命名享誉学界。他一起参与发起成立的“中华海产生物学学会”是我国第一个群众性的海洋学术团体，至今还为后人称颂。三位老学长在各自事业上的成就都是非常突出的，确是学有所成、术有专攻，当然他们的艰辛与刻苦精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常说，要想成功，必须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付出。以朱元鼎为例，为了研究鱼，他一辈子不知解剖了多少条鱼，科研经费不够时他会自掏腰包到菜市场买了鱼回家解剖；步入老年以后，他常常和青年教师一起做解剖、搞实验，忙到深更半夜；冬天里他的双手经常是又红又肿的，那是翻看鱼类标本时冻的、福尔马林药水浸的。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所有的成功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毛泽东曾说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如果人人都用自己的双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很好地实现。

我在校工作时曾常听到部分师生反映不喜欢所教的或所学的专业。我想，我们可以在三位老学长的身上找到答案。朱元鼎原来是研究昆虫的，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硕士导师就是研究绩翅目昆虫的。但是，当时研究鱼类可能比研究昆虫更有现实的经济意义，对国计民生可能更有帮助，从而吸引他转向鱼类学研究，并为之奋斗终身；侯朝海在日本留学时对气象学情有独钟，但是回国后需要他担任校长，他就在水产教育的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陈子英原来也是研究的果蝇遗传学，当需要他研究海洋生物时，他马上转身，开始新的研究，并坚持到老。其实，人的一生大多是这样的。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调研，世界 100 名各领域的杰出人士中，61 名承认，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并非他们最喜

欢的，因为人生中的不确定性，他们没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职业，但是，他们经过努力都成功了。也就是说，世界上“歪打正着”的事情是很多的。朱元璋称帝后，曾对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本是沿路打劫，不想弄假成真”。名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凡人俗子。因此，我想告诉现在还有点三心二意的朋友们，人生有很多不确定性，不必想太多，做好当下，把握机遇，不懈努力，无愧于心，只要付出肯定有收获。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不断追求，这就是我们缅怀三位老学长而应该弘扬的人生态度。

三、关爱师生，重在育人

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人。当然，现在高等学校还要承担科技创新、服务社会、引领风尚等重任，但是，核心是育人，这是永恒的主题。为了做好育人工作，教师应该加强修养。我们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就是这个道理。而老教师则不仅自己要以身作则，还要帮助和培养年轻教师，做好“传、帮、带”，以良好的教风带动学风，以良好的校风促进育人。三位老学长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堪称是“楷模”。

侯朝海一生廉洁奉公，勤劳俭朴，但他对学生却慷慨大方，关爱有加，甚至超过关心自己的孩子，真正体现了高尚的师德风范。我到校以后，听到的、读到的关于他这方面的故事是很多的。上世纪 40 年代末的上海非常动荡，那时办学的困难之巨可想而知。侯朝海不光要为学校生存殚精竭虑，还常为学生解燃眉之急。有一位学生的弟弟上高中缺乏学费，见到他过来就说起此事，他二话没说，立马掏出了 5 块钱；有的时候，他会突然于清晨的五六点钟出现在早锻炼的篮球场，给坚持晨练的学生每人一块钱的奖励，而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来找他，常常拿不到一块钱，只能失望而归……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侯朝海对学生的感情已经超越了父子之情，是纯真而伟大的师生之情！他本人常年只身住在学校简陋的单身宿舍里，没有体面的衣着，生活非常朴素。去世以后，在他的遗物中竟然没有一件奢侈的东西，真是两袖清风，一心为公，胸中装满学校师生，唯独没有他自己与家人！那是多么高尚的情操，无论怎么褒奖都不为过。

朱元鼎、陈子英作为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提携与培养青年，关心与帮助学生。朱元鼎是中国鱼类学的奠基人，在教学和科研中非常注意培养新人，他亲自带教的孟庆闻、苏锦祥、伍汉霖等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鱼类学教授；他不光授业，还注意传道，经常教导年轻人为人要诚实、待人要宽容、事事要为他人着想。十年动乱中，有的年轻人曾伤害过他，但若干年后向他请教学问时，他不计前嫌，照样热情指点、尽心竭力帮他查找参考资料。即使是他没有教过的学生，只要对鱼类学有兴趣，他都给予帮助，包括向海外有关专家推荐，为学生创造继续发展的机会。陈子英到我校工作以后，兼任养殖生物系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不光亲自上好几门课，还亲自作实验准备，亲自带学生野外实习。听说有一年他带学生到青岛实习，住在青岛大学潮湿的地下室里，那时的条件很艰苦。他全然不顾，每天起早摸黑指导学生做麻醉、注射、解剖、做标本，帮助学生掌握第一手的感性知识与制作技能。事隔几十年后，校友见面还对此记忆如新。今天，当我们为了让更多的教授们能经常主动地为大学生上课而不惜花费许多精力去研究与制订一系列政策规定的时候，缅怀与传承三位老学长的精神风范显得多么必要啊！

习近平指出：“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因此，纪念三位老学长诞辰 120 周年，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关爱学生，关心青年教师，做好引路人，争创一流业，按照学校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与要求，扎实推进上海海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办出水平，育好新人。

纪念陈子英教授诞辰 120 周年

王义强

我的导师是陈子英教授。今年是他诞辰 120 周年。回想跟随他的那些年代里，他为人、教学、科研等诸多方面，都对我产生深刻影响，让我永远缅怀。

他辗转奔波、辛勤奋斗了一生。自 1921 年毕业于东吴大学后，在遗传学家摩尔根的学生 A.M.波琳的指导下，成为燕京大学生物系第一个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后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摩尔根实验室学习。1928 年在摩尔根的学生斯特迪文特（Sturtevant）指导下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生物系教授，1952 年调任上海水产学院养殖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事业心强，干一行钻研一行。师从遗传学家摩尔根，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果蝇的遗传学研究，包括果蝇原基的发育、正常型和突变型的差别，通过突变基因表达对果蝇的镶嵌雌雄同体等突变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等。于 1931 年发表了《中国文昌鱼一个雌雄同株标本的研究》，并与燕京大学的李汝祺等合作进行金鱼的遗传育种研究。被谈家桢院士主编的《中国遗传学史》评为“第一批遗传学家与作物育种专家，为中国近代遗传学发展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福建沿海地区采集海洋动植物标本，在中国最先开展现代海洋生物学研究，成立海洋生物研究室。1932 年他发表《福建省（海洋）动物初步目录》，其中列有厦门海丝瓜、林文庆海燕等十多个新品种。他发表了《厦门的棘皮动物报告》是中国研究棘皮动物最早的论文。同年发表了《福建省渔业调查报告》对福建沿海 17 个县的渔业生产情况做了系统的总结。经过较为深入的考察研究，1932 年发表了《福建南部厦门文昌鱼的历史》，这是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昌鱼分类学。1933 年发表了《厦门文昌鱼渔业调查》。经过长期艰苦探索，促进我国海洋生物研究系统化，对我国近

代海洋科学和渔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是我国近代海洋生物研究的先驱之一。

他创建了学会,开展社会学术活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促进和发展我国的海洋科学研究,他创建了“中华海产生物学会”,这是我国专事海洋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团体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群众性海洋学术组织。学会成立后,每年暑期都在厦门举办研究活动和海产生物讲习班,为我国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1934年陈子英和秉志等30多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国动物学会,至今发展成拥有15个专业的学科分会,17500多会员。中华海产生物学会并入了中国动物学会。

调到上海水产学院后,他任教动物生理学、组织胚胎学、水生生物学等多门课程,尤其是“水生生物学”在既无教材,又无实验材料的情况下,他率领青年教师亲自编讲义,采集水生生物标本,参加教学和生产实习,以及与校外交流等活动,逐渐形成了两门系统的完整的“淡水生物学”和“海洋生物学”课程,编著了教科书。1952年设立水产生物(水生生物)学专业。这是国内率先成立的四年制本科专业,培养了一批水生生物专门人才,如今已发展为上海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学博士点。

从陈子英教授的一生经历,使我感受到:(1)他极为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他曾说过:“凡欲改进任何事业,当先以调查着手。我国提倡实业已久,但屡试屡败,正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凡言改革者,常将西国之方法全部用于中土,正如移植草木,不问土壤气候与时令之适宜与否,其不败也难矣。调查工作应在一切改进步骤之前,故其主要性不可言喻。”由于对福建省的渔业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提出了调查报告,所以对福建渔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2)工作细致认真,孜孜不倦,创造性强。许多研究工作和发表论文内容都是国内首创,为先驱者之一。(3)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总是耐心地指导和亲自示范,使他们既弄懂又能动手操作。可敬的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光辉业绩 大师风范

苏锦祥

1952 年秋，上海水产学院迎来了朱元鼎、陈子英等一批在学术界有极高声望的大教授，大大提高了学校的知名度。学校的年轻学子们也以学校拥有一批名气很大的教授而感到自豪，这些教授也深受学生们爱戴。

朱元鼎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鱼类学家，中国近代鱼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早在 1931 年发表了中国第一部鱼类研究专著《中国鱼类索引》。这是研究中国鱼类必读的著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与 1935 年发表的专著《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及其牙齿之比较研究》，均为中国鱼类研究的经典著作。

朱元鼎教授的一生是为科学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毕生辛勤耕耘，为鱼类科学和水产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他一生共发表鱼类专著 16 部，其中 13 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是国内鱼类学者中发表专著最多的作者之一。“文化大革命”后，他已年逾八旬，仍积极埋头工作，说：“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夺去的时间抢回来”，“我虽已年逾 80，但在科学的春天里，觉得自己也年轻了”，“要抓紧，要做的事情多着呢！”他将家里的写字台变成实验工作台，与助手们一起鉴定标本，修改文稿。即使生病住进医院，他仍要助手将标本和参考书带到医院一起讨论研究，后被医生发现，埋怨道：“怎么把实验室搬到医院里来了”。为了编著《福建鱼类志》，1976 年已 80 高龄的朱元鼎教授不顾旅途辛劳，亲自赴厦门主持编写工作会议，与厦门大学等兄弟单位一起对编写工作作仔细安排。该书出版后得到很高评价。他晚年 1977—1986 年间，出版主编的专著有 5 部、参编的专著 2 部、论文 21 篇。许多国外学者来华访问，对朱老如此高龄仍坚持科学事业，并发表这么多高质量、高水平的论著十分钦佩。

朱元鼎教授在科学研究中刻苦钻研、善于创新、治学严谨、一丝不苟。鱼类分类研究很重要的是依赖对一些形态构造的仔细观察。每次观察标本，他都事必躬亲，用颤抖的双手拿着放大镜认真观察，他双腿肌肉有点萎缩，仍坚持

站在解剖镜前观察标本。因年老体弱，加上连日劳累，他有时发起高烧，但仍坚持工作，还要助手为他保密，不要让家里人知道。他常讲：“做学问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求在科研记录上的每一句话、每一张图，都要和实物反复对比核实，盘根究底，孜孜以求，确保万无一失。为写好一篇论文，他字斟句酌，不断修改，对每一个学术名词、外国地名及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推敲。一篇稿子写上三五稿是常有的事，写上十几遍也并不稀罕。

朱元鼎教授甘为人梯，热情培养后辈人才。他对研究室年轻同志的培养付出很大心血。“文化大革命”前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研究室各办公室巡视，检查、了解他们工作情况和研究进展，解答他们工作中的疑问。他的严格要求，学生们当然不敢懈怠，一定会勤奋工作，不辜负老师的悉心指导。他说过：“我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一点，为你们铺路、搭桥，算是为国家尽最后一点贡献”。他以自己的榜样教育学生，“搞科研要有锲而不舍的韧性和钻劲”。朱元鼎教授以其渊博的科学知识、严谨的治学作风、坚忍不拔的钻研精神，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教授和专家。

我们纪念朱元鼎教授诞生 120 周年，缅怀老师的光辉业绩和大师风范。老师远去，风范常驻，留在世间，更烙在你我心间。

爱渔胜爱家 爱生胜爱子

—— 纪念侯朝海先生诞辰 120 周年

侯笙乐

侯朝海老先生是我校前身,即 1912 年创立的江苏省水产学校第二届渔捞科毕业生。他在校期间接受学校创始人张謇“渔权即海权”思想,并亲眼目睹日本派遣大量机动渔船侵占中国沿海渔场、掠夺渔业资源、垄断渔市、欺压我渔民等恶行,激发起毕生投入水产事业的热情。他除有段时间在政府部门从事水产生产和发展工作外,主要投身于水产教育事业。

令人敬佩的是,侯先生毕生“爱渔胜爱家,爱生胜爱子”。

一、爱渔胜爱家

侯先生家在无锡,一家四口,夫人和两个儿子。抗日战争爆发前,侯先生任政府行政工作时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他从不中途在无锡下车回家一叙。在学校工作期间,周日或一般节日,他也不回无锡,即使寒暑假,也仅回家几天后即返校。解放初,侯先生夫人丁志渊长期身体欠佳,在老家休养,侯先生依然如此。然而,夫人放心不下侯先生,曾叫儿子来沪探望。侯先生也仅一般性过问后,便让儿子回去。1950 年,夫人病故,侯先生回无锡处理完后事即回校工作。他继担任江苏省水产学校校长期间,创建航海和远洋渔业两个专科(高等专科)。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学校部分校舍被日军炸毁无法上课,他设法在市区借用民宅迅速复课。抗日战争期间,举家迁至重庆从事水产行政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恢复水产教育,他联络一批水产人士奔走相告,促成在合川国立第二中学内设水产部,后又在黄炎培等协同下,创建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初,侯先生与当时渔管处处长王以康教授积极策划在青岛的山东大学设置水产系,于 1946 年 2 月开始筹建,次年开始招生,成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四年制本科水产专业人才的大学(即现中国海洋大学前身)。该校水产系老系主任沈汉祥教授曾说过,当时没有侯先生等的努力,山大不可能设置水

产系；相继侯先生在上海联络水产界有影响的人士向社会呼吁，要求上海市政府恢复吴淞水产学校。当时在无校舍、无设施、无师资的三无条件下，加上国民政府已一蹶不振，复校相当艰巨，但侯先生不顾一切，还亲自赴南京，当面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陈述复校重要性和迫切性。最终得到当时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支持，于1947年底获得批准，定名为上海市立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但不给复校经费，不拨校舍。后在渔管处王以康教授支持下，次年在复兴岛几间平房正式复校。这里尚须提及的是，当时侯先生不顾夫人在无锡患病，为复校日夜在上海奔波。当时尽管校舍简陋，设施条件极差，但侯先生聘请的任课教师大多是著名专家教授。解放后，经华东水产管理总局决定将学校迁至军工路原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水产实验所（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因学校已在市区，更名为上海水产专科学校，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期间，经华东水产管理局申报，高等教育部批准，再次更名为上海水产学院，成为全国第一所本科建制的水产高等学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有不少是国内水产界和航运界著名人士。侯先生毕生为水产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由此可见，没有侯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吴淞水产专科学校，不可能有上海水产学院，更不可能有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过去，我们一批老同学都说侯先生爱校如家。事实上，侯先生毕生“爱渔胜爱家，爱校胜爱家”。

二、爱生胜爱子

在我们老同学中，一致认为侯先生平易近人、关爱学生。不管哪个学生有什么困难，他老人家积极设法帮助解决。他还热心支持学生活动，资助班级活动经费，如参加校外体育比赛、演出，他都经常高兴地自掏腰包。

在关爱学生方面，老校友、原上海鱼品厂总工程师斯颂声有一段动人叙述。即在1937年毕业时，正值八一三事变，日本侵华军侵略上海。他只身赴重庆梦想就业。抵重庆后，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巧遇侯先生。侯先生与他交谈后深表同情、关心，主动安排他住在侯先生租赁的宿舍里，让他在鱼市场做些调查工作。侯先生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给他支24元生活费。当时侯先生全家四口均在重庆生活，负担也相当重。不仅如此，侯先生晚上还找他谈水产界情况和水产发展前景，鼓励其奋发图强。斯颂声在学校筹募“侯朝海奖学金基金”时告

诉林济时，1944 年抗日战争形势好转，中国政府派各行各业青年赴美、英留学深造，学水产的有 4 个赴美名额。经侯先生推荐，斯颂声便成其中之一。斯颂声说：“侯朝海校长是我们全家人一辈子记在心中的恩师！”所以，斯为筹组侯朝海奖学基金时，不仅自己捐款，还让在澳洲的儿子也捐 1000 元（20 世纪 80 年代 1000 元甚为可观）。

侯先生既从生活上照顾学生，又从事业发展上不辞辛劳予以支持，尽力培养忠诚务实的水产人才。老校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与仪器研究所原所长丁永良，1952 年从学校渔捞科毕业后分配到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工作，因当地没有试验水池做有关实验来到上海找侯先生。侯先生不仅安排他食宿，还与上海船舶设计院等单位联系，帮助他顺利完成水池试验任务。

1950 年下半年到 1951 年春，我校借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群贤楼等部分校舍上课。那时没有医务室，只有挂钩的私人诊所医生。1954 届周汝偈（曾任“开创”号第一任船长）同学就读时有一天突发高烧，侯校长得知后不顾天已渐黑，两人立即雇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私人诊所求治。医生诊断是急性白喉，打了一针后立即转移到公立大医院得到及时救治。所有医药费都是侯校长支付的。周汝偈和全班同学对此终生难忘。

相比之下，侯先生对两个儿子的关心却不如学生。其长子曾是解放军海军后勤干校学生，后因患病在无锡老家休养，侯先生也难得回去看望，不幸长子竟在家病故。侯先生说起此事深感遗憾。次子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有次来复兴岛看望侯先生，说袜子破了想买双袜子，侯先生掏尽口袋的钱只够他回交大的公交车费。儿子回头离开时，侯先生叫住他，脱下自己的袜子，让儿子回去洗洗再穿。作为学校领导，能做到爱生如子已难能可贵，然而侯先生却是“爱生胜爱子”。

今天，纪念侯朝海先生诞辰 120 周年。回眸往事，总有道不尽的思念。我们应不忘初心，学习侯先生无私奉献、辛勤耕耘的精神继续前进，为建设和发展上海海洋大学作出贡献！

注：本文曾参考《回忆文集》（《回忆文集》编委会，上海水产大学，1997）和《侯朝海传》（叶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同时请林济时老师补充修改。

回忆元鼎先生二三事

伍汉霖

今年10月，是恩师朱元鼎先生诞辰120周年。先生是国际著名鱼类学家、中国鱼类分类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水产教育家、一级教授，原上海水产学院院长、名誉院长、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鱼类研究室主任，东海水产研究所原所长。历任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朱元鼎教授一生从事生物学、昆虫学和鱼类分类与形态学等研究工作。他一生共发表64部（篇）洋洋共500余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发现鱼类48新种、10新属、4新亚科。可以说先生为发展中国鱼类学研究事业和水产教育献出毕生精力。在培育人才上，先生注意教导与培养，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他悉心指导，提携后学，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著名鱼类学家。

我于1956年夏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水产生物专业。那年学校急需应届毕业生留校，作为上海水产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生，我们随即被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著名水产资源学与鱼类分类学家、教务长王以康要我留下当他的助教。次年，王以康先生夜晚在办公室编写《鱼类分类学》时，因心脏病突发离世。朱先生提出要我去海洋渔业研究室作他的助手和秘书，就这样我和其他同事一起在朱先生的关怀、培养和带领下，开展繁重的中国鱼类分类研究工作。当好他的助手，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工作的主要职责。1957至1986年30年间，历经各种政治磨难、风风雨雨，我始终侍奉恩师，直到1986年底他的仙逝。

在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生数十年来对我们的培养和教导。往事如烟，对先生一些点滴故事的回忆，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先生待人接物十分和善，刚来水院时，在住所去办公室途中、在校园内散步，不论遇见其他老师、职工或同学，如果对面相遇，不管认识与否，老远就把戴在头上的礼帽轻轻举起，向来人致意，日久成了校园“一景”。

和常人一样，先生也有喜怒哀乐之时。1960年先生指导我们4人撰写论文，